反右及扩大化

1957 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极少数居心不良者的放肆言论，加之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峻的气候，不适当地触动了毛泽东这位伟人的神经，于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原来宽松和熙的气氛陡然为之一变。

历史回顾

回过头来再看当年，许多事情也许看得更清楚些……

□ 邓 小 平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节选）

1957 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1980 年 3 月 19 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总起来说，1957 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 1959 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 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

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 1962 年 7、8 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 1964 年底、1965 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 1961 年到 1966 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1980 年 4 月 1 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 李维汉

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路线的体现。但是，从 1957 年夏季开始，由于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产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打断了全国转向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

从 1957 年夏季以后，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同样有过严重失误，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立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成为我们党团结各族人民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认真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经验，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在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工作中对城乡各阶层人民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的方针；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我们党团结全国人民，胜利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讨论统战工作。我在会上发言中分析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几个同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矛盾，提出了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意见。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其趋势是要逐步地转化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由于思想的转化总是落后于社会地位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真正改造过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盟），正处在向劳动人民联盟的过渡状态中，这些对象自身正处在分化的过程中。指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统战工作范围的矛盾的发展有以下的特点：（1）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拥挤而来。旧的排了队，提上了日程的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新的又接连着发生。（2）在第二个联盟内部，在民族地区，在宗教问题上，特别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地区，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情况的可能较多，甚至是自发的。（3）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对于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我

根据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第二，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第三，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这三条意见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承认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必须运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把对同盟者的政治教育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正确地加以解决。在这个方针和原则下，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对民族资本家，主要问题是搞好合作共事关系，这是进一步改造资本家、最后消灭这个阶级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起辅助作用的办法（如讲习班）都要减色以至落空。同时，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去年，国内国际都是大变动的一年。在国内，锣鼓喧天的后面，进行着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到了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个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从中挑拨和煽动。右派之外，还有调和的人，还有受影响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并且指出：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我们一要保持政治嗅

觉，二要进行具体分析。平常睡觉，一旦听到有贼，就拿起棍子乱挥，这就不好。指出：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

这次全国统战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为指导，深入研究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和原则，是一次发扬民主、思想解放的重要会议。现在看来，这些意见是符合党的“八大”决议的精神的。可惜以后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使这些正确的方针原则未能坚持贯彻下去。

（二）中央发布整风指示，召开两个座谈会，极少数右派乘机进攻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1957 年 4月 27 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

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检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指示》还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4 月 30 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马寅初等都到会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于 5 月初和 5 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十三次，七十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次发言。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

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 5 月 15 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陈叔通 5 月 16 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的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一、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二、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三、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偏差和错误很大很大”，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四、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五、他们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六、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右派分子人数虽然极少，但能量不小。在他们所煽动的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一部分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

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教育中间派，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三）反右派斗争的酝酿发展过程及其严重扩大化

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这年一月十八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察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

等，是不是想复辟？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 5 月 15 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 5 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两个座谈会分别在 1957 年 6 月 3 日、6 月 8 日结束，我在会上都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6 月 3 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

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6月8日工商座谈会结束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我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且批驳了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言论，指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两篇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反右派，但实际都是准备反击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从6月8日正式发动。当天，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1日，毛泽东同志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在“六·八”指示中，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在“七·一”社论中，批判又进一